

## 論宋代士僧對《華嚴經》的抄寫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黃惠菁

### 摘 要

佛教進入中國後，傳法者帶入「功德說」觀念，使得抄經蔚為風氣。華嚴經文中雖未特別強調抄經功德，但華嚴世界描繪了一座圓融莊嚴的佛國淨土，引人嚮往。自宋以後印刷技術發達，抄經並未式微，反而成為一種自我修持的主要方式。宋代士大夫頗愛《華嚴經》，認為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加以士人又多與知識僧侶建立聯繫，因此，抄寫《華嚴經》的風氣日盛，而此活動也是推動「華嚴」流行的途徑之一。宋代士僧抄寫《華嚴經》者，有單卷、單品，或整部者。其書寫的動機，或為弘揚佛法，或為生者消災增福、或為亡者祈求冥福，甚者，因基於愛好，寄情筆墨，以翰墨為佛事，以文字為布施。總上，促成宋代《華嚴經》的抄寫，不只是一項宗教活動，也具備豐富的文藝內涵。

**關鍵詞：**宋代士僧、華嚴經、佛經抄寫、功德

## 一、前言

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摩訶迦葉尊者應佛弟子請求，邀集多位尊者將佛陀一生所說的教法結集起來，使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以作後世人天眼目。<sup>1</sup>結集後的佛智慧，以文字紀錄，廣佈教法需求。為存教典，之後也衍生出「抄經功德說」，鼓舞信眾抄經佈教。

佛教進入中國後，傳法者帶入「抄經功德說」觀念，搭配傳教佛經，深具吸引力而蔚成風氣，影響力遍及各朝代、各階層。上自帝王將相，<sup>2</sup>下至自平民庶士，無不籠罩在這股風氣中。奉持者相信抄經是一方便易行門，不僅讚法、親近如來，更能受菩薩庇佑，攝取福德，消災滅罪。《佔察善惡業報經》便曾提及書寫供養經典具備的功德：

以能得聞大乘深經故，能執持書寫供養恭敬大乘深經故，能受持讀誦大乘深經故。能於究竟甚深第一實義中，不生怖畏，遠離誹謗，得正見心，能信解故。決定除滅諸罪障故，現證無量功德聚故。<sup>3</sup>

誠然如此，許多信仰者一旦遇到非人力所能處理時，輒以抄寫佛經汲取心靈力量，作為聚集福德資糧的方法之一。其目的或為生者消災解厄，增長福德，開發智慧；或為亡者祈求冥福，消除生前業障，早日度脫生死輪迴之日，成為往生佛國的助緣。

誠然因為抄經有極大的功德利益，因此書寫的準備，絕非一般。除了誠意正心外，謹慎者，更是齋戒飲食，薰香淨身，沐手除垢，清淨身心，摒棄外緣，捨去雜念，自省參驗行為有無過失，本持「以佛治心」理念，抄寫經書，護持佛法。

<sup>1</sup> 有關三藏聖典的結集過程，可參考明暘法師撰：《佛法概要》（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1990年），頁314-321。

<sup>2</sup> 據《舊唐書》記載，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春正月甲午日，「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本紀第十·肅宗》，（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月），卷10，頁260；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神宗皇帝危憊之際，太后傷心至極，手撫延安郡王說：「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列傳第一·后妃上》，（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卷242，頁8625；清代帝王抄寫佛經的習慣更是轉趨生活化，上行下效，風行草偃，抄寫佛經風氣還在臣工間產生深刻影響，皇子、親王、大臣、書法名家紛紛效法。見彭悅柔撰：〈從檔案論盛清君臣抄寫佛經的特色並淺釋文化意義〉，《史學彙刊》，第29期，2012年6月，頁137-184。

<sup>3</sup> （隋）菩提燈譯：《佔察善惡業報經》，卷下，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17，No.0839，頁909a。

## 二、佛經抄寫概述

抄寫佛經一直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形式之一。隋唐時，佛教對民眾生活影響日益深入，信眾屢屢有開窟建寺、捐田施物等宗教活動。其中，抄寫佛經更是信徒熱衷的佛事之一。

抄寫經文的目的，依唐人唐臨的《冥報記》所收諸例，可知可以消災解厄：

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眾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乃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sup>4</sup>

文中記載許多生前作孽殘害生靈或者詆毀佛法、不做佛事而被拘至陰司拷問者，最後因為寫經念佛而得免。這是屬於消極寫經一類。然更多的寫經者是採取積極的態度，是為了種福田，求功德，如同求醫問藥、燒香許願一般。<sup>5</sup>因此寫經、抄經風氣，在隋唐之時，已別為熾盛。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sup>6</sup>

信士抄經熱絡，可見一斑。考究原因，主要還是緣於「因果報應」和「功德回向」思想的宣揚，因「果報」絲毫不爽、鉅細無遺，故「身」、「口」、「意」造業性質的好壞，將直接影響果報，這一觀念卒使民眾相信抄寫佛經是一種善事，因為抄經可以具備「勝因」、「功德」、「善根」、「福」、「善果」、「勝業」及「福田」。<sup>7</sup>抄寫佛經是善因、勝因，所以必定會換取福報和吉慶。緣此，不止隋唐，遠自魏晉時期起，<sup>8</sup>即有許多出家僧人、帝王和士大夫、文人墨客及平民在家居士等等，為了弘

<sup>4</sup> (唐)唐臨撰：《冥報記》，卷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5197&page=44>

<sup>5</sup> 張國剛撰：〈佛教的世俗化與民間佛教結社〉，《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頁267。

<sup>6</sup> 《經籍志四》，(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0月），卷35，頁1099。

<sup>7</sup> 見趙青山撰：〈敦煌寫經——古人世界的折射鏡〉《光明日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2019年12月18日11版）[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12/18/nw.D110000gmr\\_20191218\\_2-11.htm](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12/18/nw.D110000gmr_20191218_2-11.htm)

<sup>8</sup> 現存寫經中，士大夫作品最早者，傳為李盛鐸舊藏的所謂《佛說五王經》，其經後記有：「景初二歲戊午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倉慈，為眾生供養，熏沐寫已。」景初為曹魏年號（西元二二七—二二九年），此時否有紙寫經，殊屬可疑，對此，池田溫教授業已指出問題所在。參見陳國燦撰：〈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普門學報》，第7期，2002年1月，頁3-4。

揚佛法，或為了祈福、報恩、布施、超薦亡者而親自寫經，或請「寫經生」抄經<sup>9</sup>；也有因寺院僧侶乃書法名家，特以抄經為媒介，接引文人、士子皈依佛教，而士大夫、文人又以書法抄經酬謝助揚佛法者。<sup>10</sup>

事實上，抄經的殊勝功德在很多經藏中皆曾敘及：《增壹阿含經》序品中，即述說寫經可積福德：「若有書寫經卷者，繒綵花蓋持供養，此福無量不可計，以此法寶難遇故。」<sup>11</sup>《六十華嚴·賢首普賢品》亦指出抄經就是佛法的護持，「令求法者意充滿」：「聽法講說及書寫，於正法中常愛樂，佛法欲滅能護持，令求法者意充滿，精勤修習佛正法，因是得成樂法光。」<sup>12</sup>《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亦曾記述寫經乃是受持經典，弘法利生之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sup>13</sup>

不惟如此，包括《辯中邊論》也提到書寫佛經，受持讀誦，可以「獲福聚無量」<sup>14</sup>。還有《法華經》、《地藏經》、《維摩詰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等眾多重要大乘經典，都明示書寫佛經有極大的功德。

歷來抄寫佛經的動機，既是懼因果，求功德，因此書寫過程意在文字，以無訛為上，不能有任何差池爽失。撰寫當下，必定修整自持，心念收攝，專注一心。《冥報記》即曾描述寫經者如何臨事謹飭，恭敬供養的完整過程：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值，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

<sup>9</sup> 唐代寫經，有所謂的專職者，謂之「經生」，其書寫佛經多以端正工穩的小楷手抄而成。這類手抄的經卷，在書法上亦有較高的水準，反映了唐代書法藝術已相當普及。經生有官府經生和民間經生兩類。官府經生由造經使統籌督管，造經謹嚴；民間經生則多籍沒無可考，或受僱於僧尼或信眾，主要在寺院抄寫。這些經生的佛經書寫，主要為生計所需，與文人士大夫撰作動機基本不同。

<sup>10</sup> 例如唐人張旭書《心經》、柳公權書《金剛經》、《心經》和智永禪師書《法華經》和宋人張即之書《華嚴經》等。

<sup>11</sup>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02，No.0125，頁 550。

<sup>12</sup> (東晉)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09，No.0278，頁 437b。

<sup>13</sup> (後秦)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08，No.0235，頁 750c。

<sup>14</sup> 世親菩薩造、(唐) 玄奘譯：《辯中邊論》，卷 3，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31，No.1600，頁 0474b。

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殷。<sup>15</sup>

從文中可見法信尼師如何看重寫經過程，不僅「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更還進一步力求俗人之濁氣不會沾染經書，每一口吐出的濁氣，都以竹管接到室外。如此嚴謹的要求，致使經書的抄寫速度緩慢，「寫經七卷，八年乃畢」。這等莊敬而完成的作品，卻使龍門僧法端等人也不免「慚懼」！因為諸人開讀後，在「唯見黃紙，了無文字」的佛經之間，照見了自己虔誠恭敬程度的不足，以致造成無緣領受佛恩的結果。<sup>16</sup>類似的記載，真實的案例也見諸敦煌文獻：

弟子等減割一米之餘，奉為亡考亡妣、七世先靈，敬造《維摩經》一部、《華嚴十惡經》一卷。弟子燒香，遠請經生朱令辯用心齋戒：香湯洗浴，身著淨衣，在於靜室，六時行道。寫經成就，金章玉軸，琉璃七寶，莊嚴具足。又願弟子兄弟、合門眷屬、諸親知識等，百惡從茲並滅，十善還來捕（補）處。法輪恒暉，三寶無難；耶摩（邪魔）歸正六道，眾生俱時成佛。安樂三年三月十四日寫訖，弟子閻碩供養、沙門玄叡受持。<sup>17</sup>

寫經者為求福報，乃於寫經前戒酒斷葷，不作歌舞，齋戒沐浴，清淨身心，以表達對佛法的尊重。這條題記不僅寫明抄經發願的緣由，而且具體描寫了經生寫經的肅穆氣氛和寫經後的精美裝幀。

事實上，《法苑珠林》不止著錄恭敬寫經的案例，也曾就抄寫心志不夠嚴謹，點出其中後果：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雜同行，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護淨，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簷，風雨蟲宇，都無驚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實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二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sup>18</sup>

<sup>15</sup>（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 27，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53，No.2122，頁 486c。

<sup>16</sup> 王美秀撰：〈從經典翻譯到救贖之道——論《法苑珠林》中「法華故事」的演變及其意義〉，《世界宗教學刊》，第 19 期，2012 年 6 月，頁 53。

<sup>17</sup>（日）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 年 3 月），頁 179 頁；轉引自趙青山撰：〈俗眾佛教信仰的法則——以敦煌寫經為考察中心〉，《唐史論叢》，第 12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284。

<sup>18</sup>（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 17，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53，No.2122，頁 415b。

顯然寫經時所持的態度不一，將影響獲得的功德。蓋寫經亦是對佛法的追求與供養，因此，只有在心無所礙，本持宗教的堅心下，功德方能實現。

### 三、《華嚴經》抄寫的功德與方式

魏晉之後，寫經風氣漸開，唐代寫經者眾，包括寫經生與士人。至宋代，雖然雕板印刷術加速了各類書籍的出版及流通，但寫經活動並未因此消滅。因緣於文藝背景，宋代士人所寫之經，雖非民間流傳佛經之來源，但成為更多後人收藏、臨摹之對象。其抄寫原由，或為個人消災解厄，增長福德，或用以之追薦亡者，祈願往生。或以寫經與緇友往來、酬贈友朋，寓法書於寫經，所謂「名手遺跡，出自精誠，廣大流通，尤當秘重」<sup>19</sup>。使原本單純為求因果，做功德的性質，發展成複雜而意義深遠的多元文化活動。<sup>20</sup>

唐宋文人寫經，主要抄寫的，包括《心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法華經》、《佛遺教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楞嚴經》和《華嚴經》等，其中因《心經》一卷書寫完畢，共 260 字，短小精悍，字字精華，功德殊勝，以致深受廣大抄經者所鍾愛。其次為《金剛經》五千多字；而《法華經》、《楞嚴經》和《華嚴經》三部經中之王，因經卷長，字數多，故往往摘卷抄寫，鮮有整部書竟者，其中又以《華嚴經》為最。

《華嚴經》體系雄闊，義海宏瞻，卷帙浩繁，其在中國即有三個漢譯本：分別為「六十華嚴」，為東晉佛馱跋陀羅所譯，六十卷，又稱《舊華嚴》、《晉經》，收於大正藏第九冊；「八十華嚴」則是唐代于闐（新疆）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又稱《新華嚴》、《唐經》，收於大正藏第十冊，總成七處，九會，三十九品。此譯本品目完備，文筆流暢，因此在中國受到歡迎；另有「四十華嚴」，係唐人般若譯，四十卷，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略稱《普賢行願品》，為該經《入法界品》的全譯本，因在貞元十二年譯出，故又稱《貞元經》，收於大正藏第十冊。三譯本中，流通最廣者，乃是唐代于闐實叉難陀的八十卷譯本，後人取閱，多為此本，如宗密所著《華嚴經疏》、《華嚴大疏鈔》，蓋八十卷本文義最為暢通，故依據者眾。至於現在通行的八十一卷本，最後一卷第八十一卷，乃是將唐代般若翻譯的四十卷本《華嚴經》中的《普賢行願品》單獨列出，附在八十卷後，成為通行的八十一卷本。不論四十、六十或八十卷本，皆是卷帙浩繁，奉持不易，抄寫更

<sup>19</sup> 〈題董宗伯法華經前〉，（明）釋澹歸撰：《遍行堂集》，見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續編》，第 4 冊（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 年 6 月），頁 335。

<sup>20</sup> 宋代印刷術廣泛流行之後，手抄書稿仍相當普遍，不只費用低廉，也因為手抄單冊或少量文書較印刷更為方便；加上宋代喜好翰墨的士人較唐代有增而無減，因此寫經活動反而益為普遍。見黃啟江撰：〈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上）〉《九州學林》，2006 冬季第 4 卷第 4 期（總 14 期），頁 61-62。

是耗時費力。數十卷《華嚴經》的抄寫，輒令古人望而卻步。是以非立宏願，否則不易竟成。

據現存資料，可知早在隋朝，敦煌即有信士抄寫《華嚴經》<sup>21</sup>，而其書寫的目的，也與佛法傳播分不開，更希望得到穰災除禍的「福田利益」。<sup>22</sup>直至宋代，在文藝渲染和抄經風氣影響下，文人抄寫的佛經中，也包括卷帙浩繁的《華嚴經》。有關抄寫佛經的利益功德，在《華嚴經》卷八十一《普賢行願品》中，說明得很清楚：

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銷除。一切魔軍，夜叉、羅剎，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啖肉，諸惡鬼神，悉皆遠離。……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sup>23</sup>

正是「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諸如此類的說教，引導著眾多僧侶及信眾抄寫經卷，布施功德。以《華嚴經·淨行品》為例，其內文主要為佛說淨化身、口、意三業的方法，是佛教徒修身、修行的寶典，日誦、摹寫當能清淨已受染污的身心。事實上，抄寫經文必需身心滌淨，齋沐即是一個嚴肅謹慎的儀式過程。而抄寫時，內在心性專注一意，安住於經文上，可以去除心中雜念與不善之事，斷除煩惱，進而引出正確的思維，深入經藏，理解經文含義，細細體會佛陀廣大的慈悲與智慧，達到身心自在。

唐代法藏所集的《華嚴經傳記》即記載多則因持誦《華嚴經》而得到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者，例如：北魏朝宦官劉謙之感應文殊菩薩慈悲加護，持誦《華嚴》，鬚鬢忽然自生的感通事蹟：

<sup>21</sup> 隋代敦煌華嚴經寫卷共十二卷，分別是開皇三年(583)宋紹演、邑敬各造一卷與開皇十七年(597)袁敬姿所造的十卷。袁敬姿所造華嚴經寫卷分別是《華嚴經卷第四》、《華嚴經卷第七》、《華嚴經卷第九》、《華嚴經卷第十四》、《華嚴經卷第十五》、《華嚴經卷第卅》、《華嚴經卷第卅三》、《華嚴經卷第卅七》、《華嚴經卷第四十七》、《華嚴經卷第四十九》，見毛秋瑾撰：《敦煌寫經書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5年12月，頁164-173。

另外，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亦收藏有六朝人所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卷(卷31)，亦是出於敦煌寫本。<http://www.yac8.com/news/15922.html>

<sup>22</sup> 吳新欽撰：〈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傳播〉，《2017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2019年3月，頁386。

<sup>23</sup>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卷40，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10，No.0293，頁846c。

華嚴論六百卷 昔北齊大和初年，第三王子，於清涼山，求文殊師利菩薩，燒身供養。其王子有闍官劉謙之，既自慨形餘，又觀王子焚軀之事，乃奏乞入山修道，有勅許焉。遂齋此經一部，晝夜精懃，禮懺讀誦并心祈妙德，以希冥祐。絕粒飲水，垂三七日，形氣雖微而丹抱彌著。忽感髮鬢盡生復丈夫相，神彩超悟，洞斯幽指。於是覃思研精，爰造前論，始終綸綜。還以奏聞。高祖信敬由來，更增常日。華嚴一經於斯轉盛。<sup>24</sup>

說明因持誦《華嚴》，傾誠懺悔，闍人也能鬚髮重生事。洵因感通事實俱在，故當時持誦《華嚴》風氣也就愈盛。除上，書寫《華嚴經》以至感通實例，在唐代亦有多則相關記載，例如：

永徽年中，定洲有禪師名修德，學徒數萬，禪之領袖也，而專業華嚴。欲寫斯經，敬為宗故。先以沈香漬水，而種諸樹。樹大，取皮造紙，而用寫經。經生、筆匠、造紙等三人，大小便並皆洗浴護淨。每一卷了，施以十縑。裝染周畢，設齋慶讚。香函盛之，志心禮拜。當設齋日，道俗雲趨。初開函時，金光遠照，徹百餘里。山東五十餘洲皆來禮經。外道俗無不聞知。<sup>25</sup>

從造紙起始到書寫《華嚴》當下，無不慎重持淨！每書一卷，又以貴重縑帛包裝，之後「香函盛之」，「設齋慶讚」，眾人志人禮拜。而設齋日，方打開函盒，「金光遠照，徹百餘里」，一片光明，現場道俗皆親眼目睹奇景。

另一例則見於澄觀的《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疏：冬葵發豔者，即鄧元爽，華陰人。證聖年中，爽有親故暴死，經七日卻蘇，說冥中欲追爽。爽甚危懼，蒙彼使命，令寫《華嚴》。寫竟，爽母墳側先種蜀葵，至冬已悴，一朝華發，璨然榮茂。鄉閭異之，乃為聞奏，則天皇帝為立孝門。<sup>26</sup>

唐人鄧元爽有親故暴斃，但經過七日後卻甦醒，告知鄧氏將壽盡，鄧元爽因此心生恐懼，對方卻教其抄寫《華嚴經》以避禍。待完成，鄧元爽母親墳前種植的蜀

<sup>24</sup>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1，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51，No.2073，頁156c。

<sup>25</sup> (唐)惠英撰、胡幽貞纂：《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卷1，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51，No.2074，頁177c。

<sup>26</sup> (唐)澄觀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15，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36，No.1736，頁114c。



葵適值冬天早已枯萎，未料，有一天竟又再開花，茂盛燦爛。鄉里皆覺不可思議，遂奏聞朝廷，武則天皇后為此立鄧元爽為孝門。

上述種種，傳達了書抄《華嚴經》後，所得感應、功德，不可思議。雖然《華嚴》經文中並未特別強調抄經功德，但華嚴世界描繪了一座圓融莊嚴的佛國淨土，引人嚮往。誠然如此，才会有信者為求更大殊勝功德，乃進一步「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和「刺血為墨」：

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剝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眾會。<sup>27</sup>

從初發心，精進不退，到不惜身命而為佈施，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這是對宗教的堅心。宋代以來，自北宋淨土宗七祖省常法師血抄《華嚴經·淨行品》始，「刺血書經」逐漸相習成風，僧侶固常為之，士人以孝聞名者亦然。不過，最初也只是單卷或其單品，至於整部八十卷「血書華嚴」最早則是由元末善繼禪師完成，引起後世文人讚嘆、僧人仿效及鼓勵。自此，「血書華嚴」才形成顯著的風氣。而根據僧傳所記，血抄《華嚴》之僧者也確實多集中在元明以後。<sup>28</sup>

自宋以後印刷技術發達，抄經並未式微，反而成一種自我修持的主要方式。而「刺血書經」更是結合「刺血」的誠心與苦行，以求「抄經」之後的功德累積，這種書寫形式，其實已超越原有廣傳佛法的意義，成為漢傳佛教發展中特有的修行實踐。<sup>29</sup>不論單純手墨抄經或刺血書寫，其中抄經皆不同於一般書法，每一步驟皆是修行，每一個字都不能有絲毫爽失，是修身養性與寄託情意的一種功夫。藉專注於

<sup>27</sup>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卷 40，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10，No.0293，頁 845c。

<sup>28</sup> 綜合學者賈杏年與李西寧的研究彙整，目前「刺血華嚴」有以下幾部：江蘇蘇州西園戒幢律寺，藏有元代善繼以舌血書寫的《華嚴經》一部。另一部現藏于光福司徒廟，乃明代崇禎年間，玄墓山聖恩寺當家和尚為表明自己是佛門的「正知見」，刺破自己的舌尖，將血符在茶盅裡，請人蘸著一筆一劃抄寫出來。這部血經所抄也是《華嚴經》，但只抄有 6000 多字。其字為蠅頭小楷，字跡秀麗飄逸。安徽九華山歷史博物館藏有明代無瑕禪師刺血研磨銀砂，歷經 28 年才抄寫成的《華嚴經》。在北京雲居寺有明崇禎（西元 1628 年）時期的僧人祖慧 7 卷舌血《華嚴經》。江西廬山博物館收藏海會寺普超和尚用血抄寫的《華嚴經》，他歷時 15 載，因出血太多，圓寂時年僅 45 歲。廣東省潮州開元寺則珍藏智誠法師血書《華嚴經》。全為元明以後的血書華嚴。見賈杏年撰：〈刺血為墨的經書〉，《蘇州雜誌》，2002 年第 6 期，頁 46；皮朝綱撰：〈棲心大乘，每以筆墨而作佛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 37-38。

<sup>29</sup> 徐郁縈撰：〈元明時期「血書華嚴」之因緣初探〉，《2014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頁 K1-K4。

抄寫佛經，增加定力，增強心念力量，達到身心安泰，一心不亂的境地。寫經者，始終相信發心必虔，實施必恭，也必不負期待：可以降伏魔怨，遠離惡道，斷絕煩惱；所有夙世怨親，亦能受法益而得解脫；在祈福自養下，種下善根，離苦得樂，兼具此生與來世的利益。

#### 四、宋代士僧對《華嚴經》的抄寫

從許多筆記小說、經藏及史傳的記載中，可知宋代士大夫頗愛《華嚴經》，<sup>30</sup>認為「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sup>31</sup>加上宋代士人多從應試入仕，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易與知識僧侶建立多方面的聯繫，因此，抄寫佛經活動日盛。其中，書寫《華嚴》以求福報，也是推動「華嚴」流行的途徑之一。<sup>32</sup>自唐代始，蘇杭一帶，講《華嚴》的僧者即多，而信奉《華嚴》而組織誦讀的經社益愈加盛行。<sup>33</sup>北宋淳化年間，僧俗結社的風氣又更為蓬勃，尤其受到淨土七祖省常法師（959-1020）的影響。根據《華嚴經持驗記》之記載：

十七歲出家受具。戒行謹嚴。習天台止觀法門。淳化中住錫昭慶。慕廬山之風。結社西湖。以華嚴淨行品。乃成聖之宗要。自刺指血。和墨書之。每書一字。三拜三圍繞。三稱佛名。又刊板印施千卷。易蓮社為淨行社。預會者。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旦及相國向公敏中為社首。一時士大夫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sup>34</sup>

省常自刺指血，和墨抄寫《華嚴經·淨行品》，開啟宋代「血書華嚴」之例。他每下筆抄一個字，就拜三拜佛，繞三匝佛，念三聲佛號，待書寫完成，特以此刊

<sup>30</sup> 例如（宋）葉夢得撰：《避暑錄話》卷上載歐陽修晚年從問顯華嚴：「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911&page=29> 除上，其餘可參考「前言」所述。

<sup>31</sup>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上，見《卍新纂續藏經》，X86，No.1607，頁576b。

<sup>32</sup> 魏道儒撰：《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7月），頁194。

<sup>33</sup> 結社念佛的風氣日漸蓬勃，除了省常，還有臺高僧法智知禮（960-1028）與其師弟南湖異聞亦於明州延慶寺創立「念佛施戒會」；而天臺的慈雲遵式和神照本如（982-1051）和淨覺仁岳（992-1064）也主持結社。黃惠菁撰：〈論蘇軾對淨土信仰的接受〉，《文與哲》，第27期，2015年12月，頁285-287。至於士庶方面，自發結社念佛，抄寫經書者，（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28亦載有一則：「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眾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誦經一卷，日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49，No.2035，頁285b。

<sup>34</sup> （清）周克復纂：《華嚴經持驗記》，見《卍新纂續藏經》，X77，No.1534，頁653c。

板印行千冊，以一本施一人，作為信仰之誓。〈淨行品〉是八十華嚴的第十一品，篇幅不長，乃佛陀在人世間宣說關於如何成就佛道的經典，主要記錄著大乘菩薩為眾生修行的一百四十一個大願，是佛陀在人間次第修行菩薩道的體悟。其特點是：隨事發願，防心不散；不捨眾生；三業清淨，圓滿菩提；持戒不犯；善用其心，獲勝妙功德。省常以血書方式，宣揚其信願，因此許多人都受其感召，約有一百二十位士大夫，千位比丘加入淨行社，陣容浩大，翰林學士蘇易簡更曾為此「血書華嚴」作序。<sup>35</sup>

省常之後，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閩中沙門文用為了使佛教界與士大夫的關係更為緊密，「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特邀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位僧俗大眾，合寫《華嚴經》。書寫未竟，文用示寂，幸有錢塘沙門志廣接續其志，歷經八年，卒成其業。王欽臣〈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一文，詳載當時過程：

自真籍東至始於晉朝，非文無以見法，非譯無以示眾。秘語再翻，群心知悟，是以歷世寶其書焉。大宋之興，四聖丕承法輪世轉，守妙道於不言之教，範蒼生於無名之德，俗仰大覺而此書益興人能廣道，是之謂也。至和二年，歲次鶉火，閩中沙門文用誠心浚發，思建勝業，以為道俗雖分，心同則一至。理苟會契合不差，將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翰林學士天水公，夙悟真乘，領會宏趣，乃與共請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人共書此經一部。事業未半，用公化去，有錢塘沙門志廣，贊成其志，歷八稔乃終，藏之于東京興國寺閣。<sup>36</sup>

據王欽臣的說法，諸人所以選擇《華嚴經》書寫，蓋注意到此經內容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此經所明，該萬法則以門戶為諭，用喜舍則以回向為先，悅歸往則以嚴侈為容，互杳莽則以廣大為目，此大方廣之本也。至若聖仙非一，神變迭興，十地同歸，趣成法界，大方廣之道也。」<sup>37</sup>

群賢共書之後，又有士大夫宋迪書《華嚴經》。宋迪生卒年不詳，僅《宣和畫譜》載：

文臣宋迪字復古，洛陽人，道之弟。以進士擢第為郎。性嗜畫，好作山水，或因覽物得意，或因寫物創意，而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登高臨賦，當時

<sup>35</sup> 省常之後，未見其他「血書華嚴」者，據知，宋徽宗曾下達禁令：「大觀四年（1110年）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本紀第二十·徽宗二》，（元）脫脫等撰：《宋史》，卷20，頁383。此後，血抄《華嚴》之士僧者，多集中在元明以後。

<sup>36</sup> （宋）王欽臣撰：〈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見（宋）宋太祖等撰、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第7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9月），卷1580，頁315。

<sup>37</sup> 同註36。

推重往往不名，以字顯，故謂之宋復古。又多喜畫松，而枯槎老枿，或高或偃，或孤或雙，以至于千株萬株，森森然殊可駭也。聲譽大過於兄道。<sup>38</sup>

按其兄宋道生卒（1014-1083）及其元豐年間（1078-1085）時，嘗作〈瀟湘晚景圖〉，又與司馬光（1019-1086）、范純仁（1027-1101）及蘇軾（1036-1101）等人有所往來交游推測，<sup>39</sup>宋迪主要活動應在仁宗與神宗朝。然各本皆未曾載其善書，但在《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中，卻記錄了宋迪書《華嚴經》第六十六卷〈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七〉，依據的是于闐實叉難陀譯的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形制為「素箋本，縱九寸二分，橫三丈一尺，楷書」，卷後有明初學者宋濂（1310—1381年）題跋：

復古，故宋洛陽人也，自幼精字畫，及長舉進士，好習經典，日書數千言，無倦筆。余向客京邸，王氏見金經一卷，字樣紙色與此相似，運筆稍縱。後有趙子昂題識，歎為書家董狐，惜名不甚傳。今偶得此，如獲拱璧焉。乙酉嘉平月金華宋濂謹識。<sup>40</sup>

《欽定秘殿珠林續編》所錄為一卷，但宋迪當年所抄，究竟為全本，或一品，抑僅止於一卷，無法確定。依文中所述，宋濂作此跋時，乃元至正五年（1345）12月，時年三十六歲。

與宋迪亦有交遊的蘇軾，亦好寫經。其所寫之經，數目亦不少，包括《圓覺經》、《法華經》、《金剛經》、《心經》、《觀自在菩薩如意陀羅尼》、《摩利支經》、《楞伽經》、《毗婆沙論》、《八師經》、《楞嚴經》之《圓通偈》等，<sup>41</sup>其中，《心經》、《金剛經》更是多次抄寫。而其抄寫原因各異，<sup>42</sup>或與朋友交誼殷厚，因應其請而作；或為宣揚佛法，永續其傳；或為祭奠父母親人，視抄經為福田；或因仕途偃蹇，增強內斂工夫等等，動機不一。其抄經活動，大量集中在五十歲以後，而這一時期，仕途艱

<sup>38</sup> 《宣和畫譜》，卷12，《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3603&page=4>

<sup>39</sup> 元豐年間，司馬光曾與其詩歌往來，作〈次韻和復古春日五言絕句〉；另蘇軾與宋家兩代皆相識，蘇軾曾題寫宋迪的〈瀟湘晚景圖〉，而宋迪十分讚賞蘇軾的題詩。元祐三年（1088）蘇軾在題寫意派畫家宋子房（宋迪侄）畫作時，還記述此事。〈跋宋漢傑畫〉，（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卷70，頁2215。有關蘇、宋兩人之交游可參考衣若芬撰：〈閱讀風景：蘇軾與「瀟湘八景圖」的興起〉，見王靜芝、王初慶等著：《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5月），頁689-717。

<sup>40</sup> （清）王杰等輯：《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3886&page=85>

<sup>41</sup> 黃啟江撰：〈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下）〉《九州學林》，2007年春季第5卷第1期（總15期），頁37。

<sup>42</sup> 劉金柱撰：〈蘇軾抄寫佛經動因初探〉，《佛學研究》，2003年1期，頁204-210。

辛，生活拮据，親舊紛紛故去。蘇軾以抄經為功德，寄託對親友的哀思，同時，也是改善個人境遇的良好願望。

在多方接觸經典後，蘇軾對於《華嚴經》的參究還是頗深的，尤其是對法界緣起思想感到高度興趣。<sup>43</sup>在接受華嚴思想後，蘇軾亦曾有意抄寫此經，可惜未能如願。據李之儀記載：

蘇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與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sup>44</sup>

蘇軾一生，雖未能完成《華嚴經》的抄寫，但對於《華嚴經》的喜愛，不言而喻。元豐二年，蘇軾得知友人劉行甫手寫《華嚴經》，立刻給予高度的肯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但見香煙橫碧縷。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蟋蟀空房語。明朝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銀山動地君不看，獨愛清香生雪霧。別來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鶴飛去。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觀》，眼淨不覷登伽女。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乳。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降日註。<sup>45</sup>

隨著生活境遇的轉變，蘇軾對佛理的融通、體悟也就益為深刻。詩中四句「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觀》，眼淨不覷登伽女。」透露

<sup>43</sup> 在〈和子由四首·送春〉一詩中，蘇軾曾充分傳達了個人對華嚴法界思想的喜愛與信仰：「夢裡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見（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卷13，頁628。蘇詩中所稱的《法界觀》，其實是指五祖宗密所作的《註華嚴法界觀門》，是闡述華嚴宗圓融法界無盡緣起的觀法的重要典籍。其中為了對應「四法界」，而有所謂的「三重觀法」——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依這種觀法，萬法都是一真法界的體現，諸緣依恃，相互具足，平等無二。這實際上是佛教宇宙觀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和『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的觀念的產物。」見孫昌武撰：〈蘇軾與佛教〉，見《文學遺產》，1994年第1期，頁67。蓋其時蘇軾在密州任上，而子由在齊州，當下北宋朝廷新舊黨爭，氣氛詭譎，新法如火如荼展開，年近四十的蘇軾已然經歷了親人生死變故，加以宦海浮沈，對人生早有一層體悟。因此在感傷青春虛度、逝去之時，想要取資華嚴法界觀的思想來泯除是非，忘懷得失，希冀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的平衡。

<sup>44</sup> 〈跋東坡書多心經〉，見（宋）李之儀撰：《姑溪居士前集》，卷38，《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001&page=56>

<sup>45</sup> 〈送劉丞丞赴餘姚〉，見（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18，頁952。

蘇軾已認識到無所不容的法界乃是「心」的造作，這項觀點正反映出禪宗與華嚴的合流，也說明蘇軾對華嚴「法界」大義已有較深入的理解和感悟。

許是手抄念想一直未能遂願，所以當蘇軾得知孫元忠為其父手書《華嚴經》一事時，特發出讚語，並指出其中的抄寫之功：

觀公奏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只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眾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sup>46</sup>

「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體現了蘇軾對佛教所講福報的篤信，褒揚抄寫《華嚴經》獲得福報的理念。有關孫樸的史料記載鮮少，<sup>47</sup>其父孫固則「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宋史》卷 341 有其傳記。<sup>48</sup>蘇軾稱譽孫固「與佛無二」、「待物如我，待我如物」，其子元忠事親至孝，因欲為亡父祈福，乃「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令蘇軾動容。除了蘇軾的題跋外，此事蘇轍亦知之，同樣為文記述：

開府孫公，曆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裡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為實立碑於塔，終身眷眷，若有過於

<sup>46</sup>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69，頁 2208。

<sup>47</sup> （宋）呂本中撰：《童蒙訓》卷中但言：「孫丈元忠學士樸，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本中言，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少有也。」《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一·儒家類》「漢」部 Kanseki Repository」<https://www.kanripo.org/text/KR3a0037/002#1a>

<sup>48</sup> 史傳稱孫固：「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列傳第一百·孫固》，（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341，頁 10876。

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sup>49</sup>

文中亦述及孫固的佛教因緣。孫固尚佛，嘗為覺山僧惠實請於朝廷，一年後得度僧。又為其立碑建塔，眷眷之心，想見其虔誠。立此，始有孫樸手書《華嚴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蘇軾題記在前，蘇轍所記在後，除了反映其人與孫固父子情誼外，也感動於孫樸的堅心，畢竟《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若無恒心，難以畢書。

與蘇軾同時代抄寫《華嚴經》者，除了孫樸外，一說向佛虔誠的黃庭堅也曾書寫《華嚴經疏》，不過，究其內容是為巽上人募緣而寫，是一種勸緣疏，並非寫經。<sup>50</sup>而一如孫樸，恭謹完成《華嚴經》抄寫者，乃哲宗朝的士人胡考甫。胡考甫生平不詳，其抄寫《華嚴經》一事，主要見諸於蘇頌的題記。蘇頌博學多才，為官清正，曾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史·蘇頌傳》稱他「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sup>51</sup>因文中蘇頌稱胡考甫為「大夫」，據此，推測胡氏亦曾任官。胡考甫書寫《華嚴經》的背景，主要見諸同朝蘇頌的題記：

予熙寧中，赴東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不救，追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天橫，通經義者以為正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人之喪，三年齋潔，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功已圓成，仰報劬勞，一陰助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勸，因覽巨軸，贊嘆不已！因假翰墨題于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陽蘇某謹誌。<sup>52</sup>

文中蘇頌提到自己親人意外死亡，飽嘗失親之痛，為此特「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天橫」。而胡考甫在面對母親過世時，其回報親恩的方式，乃是抄寫經書。他守喪三年，期間齋戒沐浴，潔淨身心，完成《華嚴經》八十卷的抄寫，每一字皆

<sup>49</sup> 〈書孫樸學士手寫華嚴經後〉，見（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卷21，頁1404。

<sup>50</sup> 據黃啟江考證，該疏文乃是巽上人「為華嚴做佛事」之後，攜《華嚴經》軸至黃庭堅處，請其惠賜疏語。疏文共一百一十二字，其末還云：「時念彌陀三五聲，追薦東村李胡子生天，西山里孟八郎強健。福田院裡貧兒叫喚，乞我一文大光錢。」並有「可持此字去，有能以百千助緣事者與之」之句，足見其為巽上人募緣而作，是勸緣疏。見黃啟江撰：〈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下）〉，頁48-49。

<sup>51</sup> 《列傳第九十九·蘇頌》，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340，頁10867。

<sup>52</sup>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宋）蘇頌撰：《蘇魏公文集》，卷72，《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289&page=164>

端正，可謂功德圓成！蘇頌展軸觀後，贊嘆不已！以為從該作品中，不只見到胡氏的精誠孝心，其書寫過程也可做為扶持信仰的最好導引。

北宋另一位特愛《華嚴經》的士大夫乃陳瓘。陳瓘（1057-1124），字瑩中，號了翁。少登進士第，於徽宗朝官至左司諫。崇寧年間，以個性耿直曾貶謫台州。《宋史》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與陳師錫被稱「二陳」，同斥蔡京、蔡卞、章敦、安敦等。雖為之忌恨，然其人品無不為之折服。陳瓘早年留心內典，精研佛法，有所省發，之後接觸《華嚴經》，深好其義，遂自號為「華嚴居士」。因對華嚴情有獨鍾，故發心抄寫《華嚴經》八十卷，恭謹嚴肅，一絲不苟。其姪孫陳淵嘗記述其書寫過程：

右筆供養發願文，乃了翁謫官合浦，過長沙時，為興化平禪師作也。翁嘗寫華嚴經盡八十卷，不錯一字，或以問之，曰：方吾落筆時，一點一畫，心無不至焉，故能如此。夫心與筆相應，而筆與經默會，則華嚴樓閣之內種種所有，莫不呈露於目前矣！以是求佛，雖不出几硯之間，曷嘗不與善財同叅乎？宜其語言之妙如佛所說，使後之以毛錐子隨喜佛事者，誦其文，可依之而入也。璪公方寫是經，謹書以為贈！紹興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姪孫淵書。<sup>53</sup>

據陳淵的說明，可知陳瓘嘗抄寫《華嚴經》八十卷，而且書竟，不錯一字。人皆異之，問其故，他回答落筆時，「一點一畫，心無不至焉，故能如此」，心與筆應，筆與經默會，形神俱化，渾然天成。這等工夫，也是建立在陳瓘長期精研，不斷抄錄的過程中。陳瓘於書法，造詣亦頗深。李綱曾云：「了翁書法，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觀其書，可以知氣節之勁也。」<sup>54</sup>陳瓘與李綱之父是同年進士，兩人互有往來，相好之情如兄弟。陳瓘素有文名，才氣凜然，李綱幼時便知其名，甚為敬佩。<sup>55</sup>對於陳瓘手抄《華嚴經》，李綱也在跋記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諫議陳公留心內典，尤精於華嚴，手寫數過，前後抄錄其要，積累篇帙。平生踐履，惟以澤物為心，處憂患如遊戲，蓋深解乎此！觀其所書，世間法界等語，真知言之要哉！<sup>56</sup>

<sup>53</sup> 〈書了齋筆供養發願文〉，（宋）陳淵撰：《默堂先生文集》，卷 22，《四部叢刊三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景宋鈔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727&page=108>

<sup>54</sup> 〈跋了翁墨蹟〉，（宋）李綱撰：《梁谿集》，卷 162，《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47&page=148>

<sup>55</sup> 陳瓘與李綱之交游，可參考周君芸撰：《邵雍弟子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91-94。

<sup>56</sup>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宋）李綱撰：《梁谿集》，卷 162，《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47&page=149>



其見解與陳淵之記不謀而合，所謂「平生踐履，惟以澤物為心，處憂患如游戲，蓋深解乎此」，說明陳瓘對華嚴的理解已經十分深刻，故能以之治心、應物，恬然於世而不驚。

除上，北宋末年《韻語陽秋》作者葛立方之父葛勝仲也曾書寫《華嚴經》。葛勝仲（1072-1144），字魯卿，丹陽郡人。紹聖四年（1097）進士。累遷國子司業，官至文華閣待制，卒諡文康。從宋史記載「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sup>57</sup>可知為政仁民愛物、頗具治績。有關葛勝仲與佛教的因緣，可由〈妻碩人張氏墓誌銘〉一文，<sup>58</sup>知其梗概。葛勝仲之妻張漚（1074-1122），「喜浮屠學，日誦其語。食不擊鮮，奉觀世音尤力，課所謂《大悲咒》者數以萬億計。嘗得寒疾瀕死，觀世音現白衣瓔珞像，升卧榻以楊枝荆芥拔其體，尋汗浹，頓愈。」平日，張氏相夫教子，恪守婦德。其住在汝州臨汝郡時，因信佛虔誠，疾病中，仍勉力上中嶽嵩山朝拜。歸後，「一夕神識去體」，家人環泣，都「剔股、燬臂、灼頂以禱觀世音像復現。」不久「光相滿室」，而張氏亦於黎明甦醒，於安度四十一日之後不幸去世。去世時「轉識不亂」，論者都認為是累善之報。可見信佛、拜觀音為葛勝仲家族之事，不僅張氏一人而已。<sup>59</sup>緣此，葛勝仲自己也信佛，他嘗手抄佛經，好友陳與義（1090-1138）曾賦詩贊之：

如來性海深復深，留書與世湔蓬心。畫沙累土皆佛事，況乃一字能千金。  
 老郎居塵念不起，法中龍象人獅子。前身智永心了然，結習未空猶寄此。  
 怪公聚筆如須彌，經成筆盡手不知。凌雲題就韋誕老，願力所到公何疑。  
 珠函繡帙芝蘭室，護持金剛竦神物。枯葵應感不足論，毛穎陶泓俱見佛。<sup>60</sup>

從詩題〈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可知葛勝仲抄寫的，正是《華嚴經》，細則雖不知，可能僅是其中一卷。葛勝仲與陳與義、陳與能兄弟關係密切，相互交遊，詩詞會友，聲氣相通，緣情放言，酬唱之作為數不少。<sup>61</sup>詩中陳與義稱許葛勝仲願力已到，「經成筆盡手不知」。此說與陳瓘自述抄經「夫心與筆相應，而

<sup>57</sup> 《列傳第二百四·葛勝仲》，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45，頁 13143。

<sup>58</sup> 〈妻碩人張氏墓誌銘〉，（宋）葛勝仲撰：《丹陽集》，卷 14，《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93&page=89>

<sup>59</sup> 黃啟江撰：〈兩宋社會菁英家庭婦女佛教信仰之再思考（上篇）〉，《法鼓佛學學報》，第 2 期，2008 年，頁 176-177。

<sup>60</sup> 〈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 7，《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516&page=8>

<sup>61</sup>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陳與義母親逝世，回汝州服喪。結識汝州知州葛勝仲。兩年後，由葛勝仲舉薦，任太學博士。後來又升任符寶郎，但不久被貶為監陳留酒稅。在汝州期間，時人以詩會友，形成汝州詩人群，其中成員包括葛勝仲、陳與義、陳與能、富直柔、宋唐年、陳恬、段拂等。

筆與經默會」，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見字不見人」，「嗒然遺其身」，<sup>62</sup>身與字化，渾然天成。

至於南宋初期，有關《華嚴經》書抄，均與大慧宗杲禪師有關。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字曇晦，號妙喜，又號雲門，諡號普覺禪師，宣州寧國（今屬安徽）人，乃禪門臨濟宗楊岐派下祖師圓悟克勤禪師的弟子，是宋代最具影響力的禪門大師之一，提倡看話禪。大慧雖屬禪宗臨濟楊岐派，但思想面向上，主張的禪法是華嚴禪。在《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中，曾多次提及宗杲和《華嚴經》的關係：

師十歲嘗謂侍者道先了德曰：「吾家因我生之後，家道日微。及十歲，忽罹回祿，一夕蕩盡。父母以余命破祖業，親族間以『善財』呼之。余雖心知其戲，實未審何等語。後因閱《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不覺失笑耳。<sup>63</sup>

這段話道出宗杲與華嚴間的連結，是始於早年家庭變故。而三十六歲時，他也曾「贖清涼《華嚴疏鈔》一部，齋之天寧」。<sup>64</sup>四十歲時，在虎丘看華嚴經，有所悟入。<sup>65</sup>七十五歲，「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闔山清眾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兩宮聖壽，保國康民。」<sup>66</sup>不惟如此，紹興年間，宗杲再主徑山能仁禪院時，當時傳法就採用了許多《華嚴經》裡的思想及用語，如「華藏世界海」、「法界」、「印入」、「一塵」等，強調「一多相即」、「大小含容」及「遠近互攝」等無礙思想。<sup>67</sup>緣此，當時與他交游，並受其感召而抄《華嚴經》者，就有劉季高與周必大兩人。

據《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記載，大慧宗杲五十八歲時，劉季高（生卒年不詳）曾手寫《華嚴經》一部，獻予禪師：

<sup>62</sup> 蘇軾在《文與可畫貧篤谷偃竹記》中提出「成竹在胸」和「身與竹化」的觀點，其《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亦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 29，頁 1522。

<sup>63</sup> （宋）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見《嘉興大藏經》，J01，No.A042，頁 793b。

<sup>64</sup> （宋）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見《嘉興大藏經》，J01，No.A042，頁 796c。

<sup>65</sup> （宋）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見《嘉興大藏經》，J01，No.A042，頁 797c。

<sup>66</sup> （宋）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見《嘉興大藏經》，J01，No.A042，頁 806b。

<sup>67</sup> 楊惠南撰：〈看話禪和南宋主戰派之間的交涉〉，《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頁 197-199。

解空居士侍郎劉公季高手寫華嚴經一部施師受持，仍請為眾普說，發明奧旨。師以衣盂建閣於花藥寺之方丈，設龕像以所施經奉其上。<sup>68</sup>

劉季高親書華嚴經施師，仍禮請宗杲為眾人說法，發明奧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亦錄其事：

杼山居士劉公，以手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揮金辦供，以伸慶懺。妙喜今日登曲泉木，為居士發揚。且要大家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群生，少有欲求聲聞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難遇，趣大乘者猶為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今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底是墨，白底是紙，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即今還有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為杼山居士證明。若證明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乘便下坡，為諸人說箇影子。<sup>69</sup>

除了劉季高外，宗杲六十一歲時，曾任左相的周必大(1126-1204)，也手抄《華嚴經》示之，宗杲還為此特作偈一首以記之：「總別同異成壞行布，圓融無礙塵入眾剎。非寬剎入眾塵非隘，居士筆端宣暢果海。因源自在我今說偈，讚揚同證一真法界。」<sup>70</sup>顯見宗杲對諸人抄寫華嚴的肯定與讚許。

南宋初期，還有一位抄經居士莫用之。莫用之生平不詳，但同時同郡人劉一止曾作〈跋莫用之書藏經〉一文，詳實記述莫用之抄經的部數：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聞而得聞，予甚喜之，久不得面。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智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其親。又於報本禪院創修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辦。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為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於今，志願已畢，真得聞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七月丙戌劉行簡書。<sup>71</sup>

上文可知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得聞而抄經，其所抄之經多達四百五十餘卷，共計四十八函，數量可觀。其中所涉者，包括《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

<sup>68</sup> (宋)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見《嘉興大藏經》，J01，No.A042，頁802c。

<sup>69</sup> (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15，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47，No.1998A，頁877a。

<sup>70</sup>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11，見《大正新脩大藏經》T47，No.1998A，頁857c。

<sup>71</sup> 〈跋莫用之書藏經〉，(宋)劉一止撰：《苕溪集》，卷21，《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186&page=111>

智度論》等，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超薦親人。莫氏抄寫佛經，身心投入，深入經藏，一分恭敬始得一分利益，恭敬越大利益也才越大，深刻體會抄經功德最為殊勝，因此長期躬身書寫，勤懇未輟。其向佛虔誠，不止寫經，還在「報本禪院」創修轉輪藏，以收藏自己所寫的多部佛經，耗費一年多時間，才完成工作。

而宋人抄寫《華嚴經》中，最著者，莫過於張即之。

張即之（1186-1263），字溫夫，号樗寮、樗寮道人、樗翁等。參知政事張孝伯之子，因祖先從四明鄞縣遷居歷陽，遂為歷陽人。曾以父蔭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使，後舉進士，歷官司農寺丞、授太子少傅、中散大夫，卒以直秘閣致仕。張即之出身世家，他的叔父是著名詞人、南宋書壇「中興四大家」之一的張孝祥，其父張孝伯亦擅書法。《宋史》本傳稱其「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sup>72</sup>

張即之因曾於兩浙任官，故與不少禪師大德往來，過從甚密，因此自號「樗寮」，意指有椿樹環繞的僧房。其傳世法書幾乎都是抄寫的佛經，每一字句，皆出自親手抄錄。其時與張即之往來的禪僧，包括笑翁妙堪和無文道璨師徒、西巖了慧、兀庵普寧、偃溪廣聞、物初大觀和希紹曇等。<sup>73</sup>他與這些禪僧詩文相酬唱，在「棲心大乘，每以筆墨而作佛事」下，<sup>74</sup>也致贈法書予禪師，彼此情誼交好，誠如清人王文治所稱，張即之「于文字布施可謂精進頭陀矣」。<sup>75</sup>

據學者研究指出，張即之書寫佛經，當與其嗜好書畫有關，非應禪師之請而作。<sup>76</sup>而其抄寫的佛經有署年月者，計有《維摩詰經》三冊、《觀無量壽佛經》、《法華經》七冊、《金剛經》至少五冊、《佛遺教經》一冊等，除上，還有未載年月及目的的《楞嚴經》、《華嚴經》及《觀音經》等經。<sup>77</sup>張即之令人感佩處，在於不止寫完十卷長、數萬字的《楞嚴經》，即使更長的八十卷《華嚴經》，也完成全本，而且累書此經，甚至「不一書」，嘗試以不同書體各寫了幾部。<sup>78</sup>可惜這幾部《華嚴經》皆已破損或散佚，無緣見其全貌。但清人雜記筆記中，卻留下幾則與張即之《華嚴經》有關的

<sup>72</sup> 《列傳第二百四·張即之》，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45，頁 13145。

<sup>73</sup> 關於張即之與禪門之往來，可參見黃啟江撰：〈南宋書家張即之的方外遊〉，《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33-164。

<sup>74</sup> 〈題董宗伯法華經前〉，（明）釋澹歸撰：《遍行堂集》，見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續編》，第 4 冊（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 年 6 月），頁 335。

<sup>75</sup> 〈樗寮《法華經》真迹〉，（清）王文治撰：《快雨堂題跋》，見《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10 冊，頁 799。

<sup>76</sup> 黃啟江撰：〈南宋書家張即之的方外遊〉，頁 154。

<sup>77</sup> 黃啟江撰：〈南宋書家張即之的方外遊〉，頁 154-157。

<sup>78</sup> 〈樗寮《華嚴經》真迹〉，（清）王文治撰：《快雨堂題跋》，見《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10 冊，頁 798。

內容，以供參考。如清人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就記述了後人對張即之《華嚴經》的修補：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一。張節之所書《華嚴經》全部，在內府失去六卷，康熙間裘日修補全，如出一手。相傳節之係水星，其書可避火。裘為節之後身，死成河神。然節之書大金國匾，知其國將火，則又何說？此第七十一卷得之杭城潮鳴寺僧，僧藏有三卷。一為梁山舟題作鎮山之寶，劫後不知存亡矣！予得之卷，退光漆原板面尚存，雕漆金嵌題籤亦樗寮書，精絕尤為難得，鈕福惇記。<sup>79</sup>

從上述文字記載可知清朝內府原藏有張即之《華嚴經》，後失去六卷，透過裘日修補全，而裘氏妙筆，修復後，竟令人有「如出一手」之感。關於這一點，在阮元的《石渠隨筆》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張即之墨書《華嚴經》一部，精神腕力獨出冠時。因內府所藏，獨缺失一卷，上以裘日修書法相近，命摹補之，極能媲美，優詔褒賞。」<sup>80</sup>另外，在《頻羅庵遺集》中，時人梁同書在聞知杭州潮鳴寺藏有張即之《華嚴經》殘卷時，也衷心冀望寺院能妥善收藏，永為鎮山之寶。其中珍貴，不言而喻：

向聞潮鳴寺有戴文進功德畫若干幅，不聞有張樗寮手寫華嚴經也，是冊不知又從何處流傳到此，雖全經零散僅存八十卷中之一，而閱世六七百年，紙墨如新不可多得，住僧當善藏之，永為潮鳴鎮山之寶。<sup>81</sup>

晚清詩人、書畫家何紹基對張即之的寫經作品，也十分看重。在吳門（蘇州）見到張即之的《華嚴經》刊本後，愛不釋手，乃應友朋要求，題詩表達贊嘆之情：「焦山石壁寶貞珉，吳會欣逢手墨新。拔戟蘇黃米蔡外，寫經規矚接唐人。」詩前跋語也提出個人對張氏《華嚴經》書法特色的看法：「其嚴整峭削，不似有宋諸名家全以行草法破楷法也。」<sup>82</sup>給予極高的評價。

<sup>79</sup> 文中陸氏將「張即之」誤書為「張節之」，〈張節之書華嚴經冊〉，（清）陸心源撰：《穰梨館過眼錄》，卷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998&page=73>

<sup>80</sup> （清）阮元撰：《石渠隨筆》，卷3，《文選樓叢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7437&page=25>

<sup>81</sup> 〈樗寮書《華嚴經》第三十六卷跋〉，（清）梁同書撰：《頻羅庵遺集》，卷10，「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2434&page=102>

<sup>82</sup> 該詩詩題是〈題張樗寮妙法蓮華經係張游甫所藏〉，詩前跋語為：「游甫云樗寮書此經，其七卷藏杭州潮鳴寺。嘉慶中，屠琴隴讀書寺中，得其一卷，其于十七葉後歸魏稼孫。咸豐庚申兵亂，稼孫以付游甫時，需次吳門也。游甫以事渡江至通州，為張妃堂分去四十八葉，游甫自存此九葉。余謂樗寮楷書世間往往有之，其嚴整峭削，不似有宋諸名家全以行草法破楷法也。珍重！珍重！聞妃堂

張即之耽心於禪悅，喜與釋氏為伍。寄情筆墨，屢以翰墨為佛事，創作許多佛經作品，其所書之藝術水準更在儕輩之上，僅《華嚴經》就有多部，且書體不一，彌足珍貴。<sup>83</sup>藉抄經以為「文字布施」，此乃佛教三施中的「法施」，也是大乘菩薩戒的「筆墨施」，功德無量，是虔誠佛教信仰的表現，此等「布施」可謂「善知識」，<sup>84</sup>故叢林樂與結交，亦屬情理中事。

## 五、結語

佛教進入中國後，傳法者帶入「抄經功德說」觀念，搭配傳教佛經，深具吸引力而蔚成風氣，影響力遍及各朝代和各階層。

許多經藏均提及書寫佛經，受持讀誦，可以「獲福聚無量」，有極大的功德利益。因此許多信仰者，輒以抄寫佛經汲取心靈力量，作為聚集福德資糧的方法之一。透過清淨身心，書寫佛經，為生者消災解厄，增長福德，開發智慧；或為亡者祈求冥福，消除生前業障，早日度脫生死輪迴之日，成為往生佛國的助緣。而書寫的準備，除了誠意正心以外，謹慎者，更是齋戒飲食，薰香淨身，沐手除垢，清淨身心，摒棄外緣，捨去雜念，自省參驗行為有無過失。本持「以佛治心」理念，靜心抄寫，祈福自養，護持佛法，以求此生與來世的利益。

從許多筆記小說、經藏及史傳的記載中，可知宋代士大夫頗愛《華嚴經》，認為「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被奉為「經中之王」，加上宋代士人多從應試入仕，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易與知識僧侶建立多方面的聯繫，因此，士僧抄寫佛經活動日盛。

北宋初，率先抄寫《華嚴經》者，乃淨土七祖省常法師。省常自刺指血，和墨抄寫《華嚴經·淨行品》，開啟宋代「血書華嚴」之例。他每下筆抄一個字，就拜三拜佛，繞三匝佛，念三聲佛號，待書寫完成，特以此刊板印行千冊，以一本施一人，作為信仰之誓。省常之後，閩中沙門文用為了使佛教界與士大夫的關係更為緊密，「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特邀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位僧俗大眾，合寫《華嚴經》。

---

不日來吳門，或有緣得觀此卷之全。吾意堂合成全璧為妙也。」見（清）何紹基撰：《東洲草堂詩鈔》，卷 27，「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1641&page=10> 詩題指向《妙法蓮華經》，實則應是《華嚴經》，蓋同治初，張游甫曾就所收藏的《華嚴經》九葉，請求何紹基作跋，何氏因在旅途中，率爾落筆，未暇翻閱全經，所以誤為《妙法蓮華經》。詳見徐邦達撰：《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3》（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10 月），頁 915。

<sup>83</sup> 張即之《華嚴經》各卷書蹟下落，據調查收藏地分別在以下幾處：北京故宮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館、蘇州博物館、日本東京高島菊次郎槐安居藏本、遼寧省博物館、香港佳士得拍賣及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見嚴崑晉撰：《以翰墨為佛事——南宋書家張即之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12 月，頁 139-140。

<sup>84</sup> 黃啟江撰：〈南宋書家張即之的方外遊〉，頁 147。

書寫未竟，文用示寂，幸有錢塘沙門志廣接續其志，歷經八年，卒成其業。群賢共書之後，又有士大夫宋迪書《華嚴經》一卷、蘇軾友人劉行甫手寫《華嚴經·法界品》。而事親至孝的孫樸，因欲為亡父祈福，亦「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同樣想回報親恩而抄寫經書者，還有哲宗朝的胡考甫。他守喪三年，齋戒沐浴，潔淨身心，完成《華嚴經》八十卷的抄寫，每一字皆端正，功德圓成；另一位特愛《華嚴經》的士大夫乃陳瓘。陳氏早年留心內典，精研佛法，有所省發，之後接觸《華嚴經》，深好其義，遂自號為「華嚴居士」。因對華嚴情有獨鍾，故發心抄寫《華嚴經》八十卷，恭謹嚴肅，一絲不苟。北宋末年葛勝仲也曾書寫《華嚴經》。葛氏家族皆信佛、拜觀音，而葛勝仲手抄的《華嚴經》，曾得到好友陳與義賦詩贊之。

至於南宋初期，有關《華嚴經》書抄，均與大慧宗杲禪師有關。當時與宗杲交游，並受其感召而抄《華嚴經》者，就有劉季高與周必大兩人。劉季高是在大慧宗杲五十八歲時，手寫《華嚴經》一部，獻予禪師；而左相周必大，則是在宗杲六十一歲時，手抄《華嚴經》以示，宗杲為此，特作偈一首以記之。此時，還有一位抄經居士莫用之。莫用之抄經部數，多達四百五十餘卷，共計四十八函，數量可觀。而知名度最大的抄經者，乃「以能書聞天下」的張即之。張即之書寫佛經，當與其嗜好書畫有關。張氏與不少禪師大德往來，過從甚密，因此自號「樗寮」。他一生抄寫多部佛經，不止寫完十卷長、數萬字的《楞嚴經》，即使八十卷《華嚴經》，也完成全本，而且累書此經，甚至「不一書」，嘗試以不同書體各寫幾部，清人阮元就曾讚賞其墨書《華嚴經》一部，「精神腕力獨出冠時」。

因緣於文藝背景，宋代士人所寫之經，雖非民間流傳佛經之來源，但成為更多後人收藏、臨摹之對象。而眾部佛經抄寫中，因《心經》一卷，短小精悍，共 260 字，功德殊勝，以致深受廣大抄經者所鍾愛。其次為《金剛經》五千多字；相對於其他佛經，《華嚴經》經卷長，字數多，故往往摘卷抄寫，鮮有整部書竟者。設若抄寫整部，必須更多堅心，其難度亦更高。宋代士僧抄寫《華嚴經》者，有單卷、單品，亦不乏整部者。其書寫《華嚴經》，或為弘揚佛法；或為生者消災增福，增長福德；或用以之追薦亡者，祈求冥福；或以寫經與緇友往來、酬贈友朋，寓法書於寫經，寄情筆墨，以翰墨為佛事，以文字為布施，所謂「名手遺跡，出自精誠，廣大流通，尤當秘重」，使原本單純為求因果，做功德的性質，發展成複雜而意義深遠的多元文化活動。可見，宋代士僧的《華嚴經》抄寫，不惟是一項宗教活動，其背後還隱寓著極其豐富的文藝內涵。

## 引用書目

### (一) 古籍

- (後晉) 劉煦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月
- (唐)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0月
- (宋) 宋太祖等撰、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9月
- (宋)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
- (宋) 蘇軾撰、(清) 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
- (宋)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
- (元)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
- (明) 釋澹歸撰：《遍行堂集》，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續編》第4冊，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年6月
- (清) 王文治撰：《快雨堂題跋》，《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10月

### (二) 專著

- 明暘法師撰：《佛法概要》，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1990年
- 徐邦達撰：《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3》，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 魏道儒撰：《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7月

### (三) 期刊

- 王美秀撰：〈從經典翻譯到救贖之道——論《法苑珠林》中「法華故事」的演變及其意義〉，《世界宗教學刊》，第19期，2012年6月
- 皮朝綱撰：〈棲心大乘，每以筆墨而作佛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2012年7月
- 孫昌武撰：〈蘇軾與佛教〉，《文學遺產》，1994年第1期
- 陳國燦撰：〈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普門學報》，第7期，2002年1月
- 彭悅柔撰：〈從檔案論盛清君臣抄寫佛經的特色並淺釋文化意義〉，《史學彙刊》，第29期，2012年6月



- 黃啟江撰：〈兩宋社會菁英家庭婦女佛教信仰之再思考(上篇)〉，《法鼓佛學學報》，第2期，2008年
- 黃啟江撰：〈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上)〉《九州學林》，2006冬季第4卷第4期(總14期)
- 黃啟江撰：〈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下)〉《九州學林》，2007春季第5卷第1期(總15期)
- 黃啟江撰：〈南宋書家張即之的方外遊〉，《漢學研究》，第26卷第4期，2008年12月
- 黃惠菁撰：〈論蘇軾對淨土信仰的接受〉，《文與哲》，第27期，2015年12月
- 楊惠南撰：〈看話禪和南宋主戰派之間的交涉〉，《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
- 賈杏年撰：〈刺血為墨的經書〉，《蘇州雜誌》，2002年第6期
- 劉金柱撰：〈蘇軾抄寫佛經動因初探〉，《佛學研究》，2003年1期

#### (四) 論文集

- 衣若芬撰：〈閱讀風景：蘇軾與「瀟湘八景圖」的興起〉，王靜芝、王初慶等著：《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5月
- 吳新欽撰：〈隋代敦煌袁敬姿所寫華嚴經寫卷的傳播〉，《2017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2019年3月
- 徐郁縈撰：〈元明時期「血書華嚴」之因緣初探〉，《2014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頁K1-K4。
- 張國剛撰：〈佛教的世俗化與民間佛教結社〉，《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 趙青山撰：〈俗眾佛教信仰的法則——以敦煌寫經為考察中心〉，《唐史論叢》，第12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4月

#### (五) 學位論文

- 毛秋瑾撰：《敦煌寫經書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2005年12月
- 嚴崑晉撰：《以翰墨為佛事——南宋書家張即之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12月

#### (六) 電子資料

- (唐)唐臨撰：《冥報記》，卷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5197&page=44>

- (宋) 李之儀撰：《姑溪居士前集》，卷 38，《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001&page=56>
- (宋) 蘇頌撰：《蘇魏公文集》，卷 72，《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三·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289&page=164>
- (宋) 陳淵撰：《默堂先生文集》，卷 22，《四部叢刊三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景宋鈔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0727&page=108>
- (宋) 李綱撰：《梁谿集》，卷 162，《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47&page=148>
- (宋) 葛勝仲撰：《丹陽集》，卷 14，《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93&page=89>
- (宋) 陳與義撰：《簡齋集》，卷 7，《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516&page=8>
- (宋) 葉夢得撰：《避暑錄話》，卷上，《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911&page=29>
- (宋) 呂本中撰：《童蒙訓》，卷中，《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一·儒家類》，「漢リポ Kanseki Repository」<https://www.kanripo.org/text/KR3a0037/002#1a>
- (宋) 劉一止撰：《苕溪集》，卷 21，《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186&page=111>
- 《宣和畫譜》，卷 12，《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3603&page=4>
- (清) 王杰等輯：《欽定秘殿珠林續編》(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3886&page=85>
- (清) 阮元撰：《石渠隨筆》，卷 3，《文選樓叢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7437&page=25>
- (清) 陸心源撰：《穰梨館過眼錄》，卷 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998&page=73>
- (清) 梁同書撰：《頻羅庵遺集》，卷 10，「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2434&page=102>
- (清) 何紹基撰：《東洲草堂詩鈔》，卷 27，「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1641&page=10>
- 趙青山撰：〈敦煌寫經——古人世界的折射鏡〉《光明日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2019 年 12 月 18 日 11 版)[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12/18/nw.D110000gmrb\\_20191218\\_2-11.htm](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9-12/18/nw.D110000gmrb_20191218_2-11.htm)

## (七) 佛典資料

本文佛典引用主要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22CBETA 漢文大藏經，各本如下：

-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T02，No.0125  
(東晉)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T09，No.0278  
(後秦)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T08，No.0235  
(隋) 菩提燈譯：《佔察善惡業報經》，卷下，《大正新脩大藏經》，T17，No.0839  
世親菩薩造、(唐) 玄奘譯：《辯中邊論》，卷 3，《大正新脩大藏經》，T31，No.1600  
(唐) 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 1，《大正新脩大藏經》，T51，No.2073  
(唐) 惠英撰、胡幽貞纂：《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卷 1，《大正新脩大藏經》，  
T51，No.2074  
(唐) 澄觀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5，《大正新脩大藏經》，  
T36，No.1736  
(唐) 道世撰：《法苑珠林》，卷 27，《大正新脩大藏經》，T53，No.2122  
(唐)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卷 40，《大正新脩大藏經》，T10，No.0293  
(宋) 祖詠編、張掄序、宗演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大藏經》，J01，No.A042  
(宋) 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5，《大正新脩大藏經》，T47，No.1998A  
(宋) 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28，《大正新脩大藏經》，T49，No.2035  
(明) 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上，見《卍新纂續藏經》，X86，No.1607  
(清) 弘璧輯：《華嚴感應緣起傳》，《卍新纂續藏經》，X77，No.1533  
(清) 周克復纂：《華嚴經持驗記》，《卍新纂續藏經》，X77，No.1534

